

延安时期开创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

□ 郭建明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和党性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创了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党性教育经历了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党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党性锻炼，再到在全党提高党性基础上的七大胜利召开，以及之后继续提高党性的历史过程。

“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延安时期有关党性的论述是很多的，其中中央“五大书记”关于党性的论述最为经典。毛泽东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他结合当时党内现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刘少奇从阶级性的角度界定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朱德从党和军队关系的角度探讨党性，指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周恩来从领导干部立场的角度阐释党性，强调：“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

神。（六）要有高度纪律性。”任弼时从组织关系角度看待党性，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党的领导

第一次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1941年前后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艰难的时期，党要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但此时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是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要求全党增强党性。问题的直接起因是皖南事变。我们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对皖南事变的讨论直接引发了对党性问题的关注。中央强调，党性教育、党性学习问题是决不可轻视的绝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由王稼祥作主题报告，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围绕党性问题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党性问题的决定。王稼祥在王若飞辅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完成起草工作，经政治局讨论修改后通过，于1941年7月1日建党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正式发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阐述了增强党性的极端重要性，列举了党员违反党性的5种倾向以及这些倾向的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并规定了6种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办法，例如“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

后，毛泽东嘱托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方面的文章。1941年10月至12月间，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和“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等方面指明了增强党性的途径。在延安整风学习中，面对广大学员的疑问，任弼时又去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为什么要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对《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权威解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全党开展党性锻炼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

党性锻炼和提高的重要平台

党员的党性修养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及实践锻炼，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党性锻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号召全党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增强党性锻炼，更好地统一党的意志、巩固党的团结。9月至10月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同时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重要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开始。此后中央宣传部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从多个方面论及了党性锻炼。1944年，经毛泽东推荐又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该文分析了李自成农民政权覆亡的原因——首领腐化和宗派斗争，对全党的党性锻炼发出了警示。

这一时期，党中央带领全党把学习、调研、宣传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任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认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严重，主动进行“补课”，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写出了《米脂杨家沟调

查》《兴县调查》《出发归来记》等调研报告。这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参加整风，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一个典范。《解放日报》结合当时的党性检查展开了集中的宣传报道，这种宣传报道创造性地发挥了自我反省的作用。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许多同志严于剖析自己的文章，如邓力群的《我来照照镜子》、崔哲的《宗派主义倾向在我身上是怎样具体表现的》、韩作黎的《我是怎样反省自己的》。在整风学习中，军事学院结合党性检查，提出了党性锻炼检讨的8项具体标准，在当时影响很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分清了路线是非，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通过整风，全党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从而确保党的七大顺利召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为鼓舞大会代表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为大会代表题词——“提高党性”，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党性，做党性坚强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党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他在《七大上的结论》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七大召开后，党中央发动全党对七大路线和七大党章开展大学习，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继续“提高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当前，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的建设领域，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需要辩证地看待、理性地分析、客观地把握“喜”与“忧”、“难”与“易”、“常”与“变”等对立统一关系。

“喜”与“忧”。当前，非公党建工作总体态势喜人，潜在问题忧人，具体表现为“三喜两忧”。即，形势发展之喜，改革开放40年来，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抓好非公党建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政策布局之喜，党中央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出台实施“工作经费税前列支”“党费全额返还”“支持园区党群活动中心建设”等政策，为非公党建工作开展提供了动力保障；探索实践之喜，园区党建、律师行业党建、互联网企业党建等工作亮点纷呈。同时，也要看到非公党建工作起步晚、基础弱的实际，存在发展不均衡之忧，与传统的农村、社区、国企、机关等领域相比较，仍处于后发和追赶阶段，其自身发展程度也极不平衡；非公党建还缺乏持续稳固普惠的扶持机制。这些都需要通过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实践发展中不断解决。

“难”与“易”。“难”主要在“特殊性”。抓好非公党建工作，既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自身的特殊性，在思想引领、情感沟通、互惠传导等方面下更多的气力，探索出一套符合非公党建自身发展规律的工作方法。“难”也“难”在基础性。针对存在的基层党务力量配备与现实发展需要还不完全适应，“兼而不专”的现象突出，党组织体系建设时而滞后于非公组织自身发展，神经末梢的盲点空白点需要动态补齐、常态刷新等现实问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础性工作中。“易”则是“易”在共通性。只要各级党组织真正重视起来，从夯实执政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来谋划，敢抓敢管、真抓严管、常抓长管，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非公党建工作必能蓬勃发展、硕果累累。

“上”与“下”。要注重把高层指导谋划和基层探索实践两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来，上下结合、合力推动，扎牢非公党建工作根基。高层谋划要把握“时”“势”“度”。“时”就是要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切入点；“势”就是要准确判断形势发展，积极作为、务实有为；“度”就是要尊重规律，科学统筹，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落实。基层实践要注意“严”“细”“实”。“严”就是要坚持政治标准，突出政治功能，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细”就是要耐心细致，舍得花时间、下细功夫，不搞大水漫灌，做到“润物细无声”；“实”就是要按照“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把每项工作落到实处。

“破”与“立”。“破”就是要破除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思维观念和运行机制。要破除“行政思维”，避免简单采用行政化的手段和方式抓非公党建工作；要破除“套路思维”，避免不顾非公组织特点，简单套用传统的党建媒介和手段开展工作；要破除“特例思维”，不能片面强调非公所有的特殊性，使非公党建工作偏离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布局。“立”就是要扭住落实党建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立规矩、建制度、理机制，通过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坚持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形成共同抓好非公党建工作的合力；通过从体制机制、保障政策、队伍建设、组织领导等多方面，织密制度链条，完善政策网络，厚植工作根基和基础。

“统”与“分”。“统”就是要坚持“一盘棋”，自觉把非公党建工作纳入城市基层党建的整体布局，牢固树立全面统筹、开放融合、互促共建理念，坚持条块统筹、多方面联动、多战线并举，系统推进非公党建工作，积极发挥在促进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分”就是要坚持分类指导，不搞

处理好非公党建工作中的八对关系

□ 仇 赞

“一刀切”“杂锅炖”，分类抓好园区、商圈市场、互联网企业、影响力外资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大型企业、异地商会、个私协会等党建工作，以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行业党建为重点，统筹抓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等党建工作，不断提高工作针对性和精准度。

“虚”与“实”。要彻底摒弃“党建工作虚、业务工作实”“重业务轻党建”等错误认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观念，突出政治引领，着力解决党建工作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要认真研究解决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问题，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大局的结合点、切入点，积极拓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促进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发展相融合、与社会公共治理相促进，努力把非公党建工作做实了出生产力、做强了增竞争力、做细了提凝聚力，凸显非公党建工作的实际、实用和实效。

“量”与“质”。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从基础性工作入手，积小胜为大胜，把扩大非公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作为经常性任务，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确保建而有效，实而有质，稳固提升。坚持典型引路、抓点带面，建强党支部，推进规范化，带动非公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对非公党建工作运行中存在的难点弱点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对症下药，既治标也治本，为非公党建工作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和条件。

“常”与“变”。“常”就是要充分考虑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切实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尊重特点，在强化两个功能、扩大两个覆盖、发挥两个作用等基本任务上持续用力，稳步推进，步步为赢。“变”就是要准确把握“非公党建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形势判断，变思路、变方式、变投入，提前落子布局，赢得工作主动。要变思路，从“线性”思维方式向“螺旋”思维方式转变，把非公党建作为一项有目标、没终点，却总有新起点，永远螺旋上升的事业来看待和推进；要变方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善于运用“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等手段，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党的声音；要变投入，彻底摒弃姓“公”姓“私”狭隘观念，对党的基层组织一视同仁，加大力量配备，保障投入和政策倾斜，使非公党建投入与其体量和地位相匹配，与形势的发展需要相适应。



李兆麟：为“夺回我河山”浴血奋战

□ 王恩宝



李兆麟是东北抗联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历任东北抗联第六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李兆麟从小就立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誓言，终生为之奋斗实践。

组建义勇军露头角

1932年2月，作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员、中共党员的李兆麟被党组织派回家乡辽阳从事组织义勇军斗争工作。组织动员义勇军、山林队参加抗日充满艰巨性、危险性。因为义勇军、山林队大多是土匪出身，他们既有抗日的一面，也有掠民害民的一面。李兆麟以广泛的社会关系为依托，以民族大义为导引，宣讲“拧成一股绳”团结抗日的道理。通过耐心细致的鼓动说服工作，最终把辽阳一带的义勇军、山林队聚集到抗日救国道路上来，统一组成第二十四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2年3月底，李兆麟充分运用“中国人应打日本”的统一战线策略，通过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巧妙活捉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久留岛。当时有人建议杀掉久留岛，李兆麟没有同意。他认为杀掉久留岛，可能导致敌人报复当地老百姓。最后，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对久留岛

审讯教育后予以释放。这一举措造成很大影响，义勇军声威大振。

1932年8月底，李兆麟率部参加攻打奉天城（今沈阳）战斗。义勇军攻破东塔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多架，击毙日伪军二三十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这一壮举震动了全中国，给刚刚上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一个大大“见面礼”。日本侵略者把这次战斗视为满洲形势“十分可虑”的事件之一。

多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心，使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声名鹊起，成为辽阳一带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抗日队伍。李兆麟在组建、领导义勇军对敌斗争中崭露头角，显示出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

在领导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李兆麟还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性抗日组织，使其配合、支援义勇军斗争。

踏破兴安山万重

1936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联军总司令部认为，为了长期坚持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汤原后方根据地。

为加强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被安排留守汤原，兼任留守处主任。他积极主动协助汤原各县县委，加强游击根据地建设。李兆麟认为，“里面区”（党组织）为骨，“表面区”（抗日会）为肉，交通为筋；要通过“里面区”工作推动“表面区”工作。与此同时，他领导了组建青年义勇军和游击连等地方武装抗日装工作，为建设小兴安岭

汤旺河后方根据地耗费了大量心血。

1937年2月，在掌握敌情的基础上，李兆麟指挥第六军一支200余人的部队远距离奔袭，乘夜急行军潜入铁力神树日本兵营，击毙顽抗的日本指导官，令伪军警投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解放了数百名劳工。

李兆麟十分善于抓部队的政治工作，经常结合实际给战士讲形势任务，讲亡国奴的滋味是难受的，国家灭亡是民族的最大耻辱，鼓励大家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他没有官架子，对大家循循善诱，热心帮助，和蔼可亲。

1938年年底，作为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兆麟在率部越过小兴安岭的千山万水向西部山区远征途中，创作了一首《露营之歌》。这首战歌是他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和当时身边的战友切磋写成的。《露营之歌》文辞精美，诗意浓郁，激昂雄壮，构思巧妙。“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尽人皆知的反映抗联艰苦生活、顽强战斗的诗句，深受广大战士和民众喜爱。

平原游击勇杀敌

1939年5月以后，在广袤的黑嫩、松嫩平原，作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领导全军将士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李兆麟强调部队必须与群众同心协力，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指出密切与群众联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应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成为群众的宣传者、组织者。按照这一指示，第三路军指战员在各地深入

了解群众的反日情绪，宣传抗联是人民的抗日武装、抗日必胜的前途，诚心诚意与统一战线对象共生死、同命运，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反日斗争。第三路军以骑兵为主，他们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游击战术，突击、伏击、袭击、阻击、截击、追击日伪军，具有很大杀伤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第三路军的平原游击战争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李兆麟注意积累、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掌握有利时机，以克敌制胜。他提出建立新的军事据点、改善游击战术，即利用山区“山势出入，便于隐蔽，易于接触群众”的条件建立“密营”的思想对于深入开展游击战具有重要意义。他不是驻守在总指挥部进行指挥，而是亲自到战争前线靠前指挥，并做到谋略在前，每一次重要军事行动都要周密计划、部署。他直接到在讷河活动的第二支队，鼓舞士气，和第二支队将士一道进出讷河、德都、北安、克山等县，勇敢杀敌。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第三路军广泛、深入地开展平原游击战，其活动范围包括黑龙江省十七八个县。李兆麟率部先后攻打克山、肇源两座县城及30多处“集团部落”、伪警察署、日本“开拓团”等日伪据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册的光辉篇章。

1946年，李兆麟被中央指定为东北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由于他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内战的真面目，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在哈尔滨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害。2009年，李兆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